

十 九 世 纪 三 部 曲

资本的年代

THE AGE OF CAPITAL

1848 — 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 张晓华 等译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胜利者和受害者同台演出

十 九 世 纪 三 部 曲

资本的年代

1848 — 1875

THE AGE OF CAPITAL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 张晓华 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的年代 / [英] 霍布斯邦著; 张晓华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3

(十九世纪三部曲)

ISBN 7-80173-546-3

I. 资… II. ①霍…②张… III. 世界史—史料—17~19世纪 IV. 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239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5-2977 号

THE AGE OF CAPITAL by Eric Hobsbawm

First published by Weidenfeld & Nicolson Ltd., London

Copyright © 1987 by E. J. Hobsbaw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06 by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十九世纪三部曲 (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

作 者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
译 者 王章辉 张晓华 贾士薇
责任编辑 吴昌荣 李 璞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九章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77 印张
字 数 91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546-3/K·071
定 价 88.00 元 (三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E-mail: icpc@95777.sina.net

邮编: 100013
传真: 84257656

作者简介

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 14 岁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霍氏现居伦敦。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 19 世纪为主，并延伸及 17、18 和 20 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大至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 14 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匪徒》、《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



总发行人：王庆
总策划人：陈大利

在《革命的年代》中，作者透过“双元革命”——即法国政治革命和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追溯了1789年至1848年间欧洲生活的变迁。在其后的若干年里，革命的火焰逐渐熄灭。在其灰烬之上，一套新的精神与价值发展起来，共同构造了“资本的年代”。

在1848—1875年间的这段历史中，作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资产阶级文化的确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资本经济在全球的扩展，财富的持续集中，人口的迁移，欧洲与欧洲文化的统治地位，这些都使19世纪第三个25年成为一个分水岭：它成为一段历史，但不仅仅是欧洲的历史，而且也是世界的历史。

作者的并非总结事实，而是将事实纳入一个历史体系，试图“理解”这个历史阶段，并在那里追溯当今世界的根源。他结合经济与政治、知识的发展，对革命及革命的失败，对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特征的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乃至资产阶级理念的受害者与胜利者，都进行了客观而新颖的论述。



责任编辑：吴昌荣 李 璞

特约编辑：王鸣迪

装帧设计：海云书装

销售热线：010-64462080

读者信箱：tobebook@sina.com

<http://www.tobebooks.com>

序言

笔者关于世界现代史（即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共有三本。第一本《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早已问世，第三本尚未动笔，本书则介于二者之间。由于它独立成卷，对读过或没有读过第一本的读者都具有可读性。不过对读过第一本的读者我要表示歉意，因本书零零星星地收进了他们业已熟知的材料。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尚未涉猎第一本书的读者，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出于类似的目的，我也简略地为以后发展趋势作了几点提示，特别是在第十六章“结局”中。与《革命的年代》重复的资料我当然会尽量削减到最低限度，并将它们分散开来，以免使读者生厌。读者可视此书为独立篇章，只要记住本书并非处理一个孤立的、与其前后截然分开的时期即可。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无论如何，对任何受过一般普通教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应该是完整的。它是为普通读者而不是为历史学家所写的。社会为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历史学家如能正当使用这些史料，就不应专为其他史家而写，不论他们使用史料的数量是多是少。一般读者若能对欧洲历史有基本的了解，是会有好处的。笔者相信那些搞不

清攻陷巴士底狱或拿破仑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的读者，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虽能设法应付，但具备这些知识，定会有些帮助。

本书所述的时代较短，但其跨越的地界却很大。以欧洲——事实上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来写 1789—1848 年的世界史，并非不切实际。然而随之而来的四分之一世纪，就再也不能纯粹以欧洲史来概括了，因为 1848 年后资本主义经济向全世界辐射，撰写这个时期的世界史如不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其他几个大洲，必定荒诞可笑。我是不是也太欧洲中心主义了呢？可能有此嫌疑。欧洲历史学家对欧洲的了解比对其他洲的了解要多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们遂情不自禁地从他们所处环境的特别有利地位来欣赏全球景物。美国历史学家对同样的景物会有某些不同看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无论怎么看，19 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仍是以欧洲为中心。例如美国，那时虽已露出它必将成为泱泱大国和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苗头，但它那时的经济实力还很弱小，只能自给自足而已。事实上，那时的美国也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庞然大物：1870 年其人口比英国多不了多少，与法国不相上下，比后来很快形成的德意志帝国还略少一些。

我将本书分成三个部分。1848 年革命是这一时期发展主线的前奏。对于几条主线的开展，我是从欧洲大陆角度观察的，但只要有需要，也将从全球角度加以探讨，不过我并不企图把它写成一系列面面俱到、内容完整的“国家”史。欧洲以外的世界占有两章篇幅。在这两章里，我不能不着重探讨若干重要的地区和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每章均以主题划分，而非以年代先后为序，当然其中包含的年代仍是清晰可辨的。这些年代是：寂静但对外实施扩张的 19 世纪 50 年代，比较动荡的 19 世纪 60 年代，以及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交替出现的 19 世纪 70 年代。第三部分包括了 19 世纪第三个 25 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横断面。

我的目的并非是将已知的事实作一番总结，亦非叙述何时发生何事，而是将事实归纳起来，进行整体的历史综合，从而“了解”19 世

纪第三个25年，并在一定限度内把我们今日世界的“根”追溯到那个时期。本书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展现这个时期无与伦比的特征。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因此显得那么生疏，那么遥远。至于这本《资本的年代》是否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得由读者去判断。本书的看法，特别是与很多人观点相左的看法是否正确，得由我的史学界同行们去评论。同行们显然不会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著书人总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广泛注意，热情颂扬也好，愤怒指责也罢，能引起热烈讨论就不错。我不敢存有与评论家打场笔墨官司的奢望，在这一版里，我只是把几处印刷错漏和某些明显错误（有些明显错误已引起我的注意）纠正一下，调整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句子，如此而已。当然在与我的系统阐述方法不相矛盾的情况下，也认真考虑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全书基本上是依然故我。

不过，一般读者似乎对我有些误解，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天生情有独钟的某些评论家。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情显然不及他们。这个误解我想必须澄清。历史学家有责任让读者了解其政治倾向，所以我在“导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无意掩饰自己对本书所述年代的某些厌恶，甚至某种鄙视，但由于敬佩这个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由于竭力想去理解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因而稍有缓和。”有些人认为这段话就是作者将以不公正态度对待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取得胜利的宣言。鉴于有些人无法看懂书中的内容（这内容与他们认为必须有的内容大相径庭），我要斩钉截铁地说：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至少有一位评论家正确地承认：“不仅这本书的撰写宗旨是要突出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这本书最为赞同的还是资产阶级。”是也罢，否也罢，这是资产阶级的时代，我只是原封不动地把这个时代再现出来，为此我甚至不惜忽略了其他阶级，未能留出足够篇幅来表述其他阶级在这个时代所占有的分量。

我不能说我是一切问题的专家，我只是对与本书有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精通而已。而且我还不得不几乎全部依赖二手甚至三手

资料。不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研究19世纪的著作已可堆成高耸入云的大山，使历史的天空黯然失色，而每年在高山顶上仍有新的作品不断增添。当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扩大到无所不包，事实上囊括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感兴趣的各个方面时，需要吞噬的材料更是数不胜数，连最博学、最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也感到无法应付。材料必须精简，精简成一段或两段，精简成一行，或一笔带过，或只作细小的处理，或索性忍痛割爱。历史学家必然要借鉴他人作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只能浏览一下而已。

不幸的是，如此将打破学者们令人敬佩的常规做法。按照常规做法，学者们对其资料来源，特别是对有过帮助的人总要谦恭地铭谢一番，因此只有原作者才能声称其个人所发现的智慧财产他人皆可使用。然而我在书中信手拈来的所有点滴想法，其原出处是来自哪本书或哪篇文章，或哪次谈话，或哪次讨论，我怀疑我是否能列出。我只能请求那些被我有意识或无意巧取豪夺的作品的作者原谅我的无礼了。再说如果定要寻根究源，那将增添一大堆对本书不太合适的索引和注释，徒增书的篇幅。无论如何，我只能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中注释几乎完全限于引用的统计资料和其他数字，以及某些有争议或令人瞠目结舌的引述来源。未加附注的其他数字大多数摘自标准材料，或摘自马豪尔的《统计辞典》(*Mulhall's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等极为珍贵的简明资料。涉及的文学著作——即俄罗斯小说——只提及书名，因为这些小说版本太多，本书作者看的版本读者不一定都能找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是那个时代主要的当代问题评论家)的作品，都是大家熟悉的书或信札，根据的是现有标准版(东柏林：1956—1971年)的卷次和页数。至于地名，凡有英文的就写成英文地名〔例如慕尼黑：(Munich)〕，没有英文的，就用当时出版物上通常用的名字〔例如普里斯堡：(Pressburg)〕，其中没有任何民族偏见。如有必要，会将该地的今名附加在括号中，例如莱巴赫〔Laibach，今名卢布尔雅那(Ljubljana)〕。

已故的齐诺 (Sigurd Zienau) 和赫斯凯尔 (Francis Haskell) 审阅了科学和文艺部分，并纠正了我的某些错误。科文 (Charles Curwen) 解答了有关中国的问题。发生的错误和疏漏我难辞其咎。罗杰斯 (W.R.Rodgers)、克劳丁 (Carmen Claudin) 和莫伊莎 (Maria Moisés) 不时抽空来充当助理研究员，给我提供了极大帮助。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编辑洛登 (Susan Loden)。

导 言

19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词汇里多了一个新词：“资本主义”（capitalism，《革命的年代》导言中说“资本主义”一词的出处可追溯到1848年以前。然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方知这词不可能在1848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所以将本书定名为《资本的年代》是很恰当的。这个书名也使我们想起最令人敬畏的资本主义评论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Das Kapital*, 1867年），该书亦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是1848年后数十年历史的主旋律。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胜利。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是要依靠资产阶级来主宰沉浮，资产阶级的活力、价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与其地位相当的程度，并牢牢保持其优势。依此为基础的经济，据信不仅能创造丰富而且分配适当的物质财富，还能创造日新月异的人类机遇，摆脱迷信偏见，讲究理性，促使科学和艺术发展。总之，创造一个物质和伦理道德不断进步、加速前进的世界。在私有企业任意发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无几的障碍均将一扫而光。世界机制，或谓尚未摆脱传统和迷信势力的世界机制，或谓不幸得很不是白皮肤（最好原籍是中欧、

西欧、北欧的白皮肤)的世界的机制,将逐步向国际模式靠拢,即领土明确的“民族国家”,有宪法保证的财产和民权,有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为财产、人权负责的代议政府,以及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让普通百姓参政,不过关于这点有个限度:得保证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排除资产阶级被推翻的危险。

追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是本书的任务。资产阶级在1848年前的60年里已经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在经济阵线、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皆取得胜利。只要记住这一点足矣。1789—1848年的岁月,已在早些时候出版的拙著《革命的年代》中详细讨论过(参见本书《序言》,以下我还将不时向诸位读者提及该书)。那个时期的主线是双元革命:由英国发起主要限于英国的工业改造和与法国有关主要限于法国的政治改造。两者异曲同工,皆是新社会的胜利。至于这个社会是否就是已大获全胜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个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之为“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当时人可不像我们在这般肯定。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背井离乡、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世纪30—40年代是充满危机的年代,前景未卜,只有乐天派才敢对其结果作出预测。

不过在1789—1848年期间,由于两大革命双管齐下,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统一的美、对称的美。在某种意义上,这段历史更容易写,也更容易读,因为这段历史有个明显的主旋律,有个显著的形状,而且这段历史年代的起讫也很清晰,其清晰度就像我们有权希望人类事物应该呈现的那样。本书的起点是1848年革命。随着1848年革命结束,以前的对称不复存在,形状变了。政治革命偃旗息鼓,工业革命昂首挺进。1848年是“民族的春天”,是欧洲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几乎)名副其实的革命,左派的理想暂时实现,右派经历了一场噩梦,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以西的绝大部分欧洲大陆旧政权,同时被

告推翻；从丹麦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到西西里的巴勒摩（Palermo），从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Brasov）到西班牙的巴塞罗纳（Barcelona），几乎无一幸免。这是预料中的事。这是双元革命的结果，是双元革命合乎逻辑的产物。

革命失败了，全球性、迅速而且无限期地失败了——政治逃亡者几年后还未认识到这次失败是无限期的。从此以后，1848年前设想的那种普遍的社会革命，不复出现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先进国家的）边缘地区和落后世界，进而演变成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不过在本书阐述的时期内，这类运动仍处于“低度开发”，是段插曲，而且陈旧。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显然是方兴未艾的发展，为“先进”国家的政治带来了若干选择。（英国的）工业革命吞食了（法国的）政治革命。

所以本书叙述的历史是一边倒的历史。主要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是这个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大踏步前进的历史，是认可这些进步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大发展的历史，主要表现为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虽然欧洲资产阶级对全力夺取公共政治统治权方面还羞羞答答。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革命的年代尚未结束。欧洲中产阶级之前已被人民吓破了胆，而且仍心有余悸：“民主”据信仍将肯定而且迅速地演变成“社会主义”的序曲。在资产阶级的凯旋时刻，正式主持资产阶级秩序的人物，在普鲁士是一位极其反动的乡下贵族，在法兰西是一个冒牌皇帝，在英国则是一连串的地主贵族。对革命的恐惧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根深蒂固，这说明资产阶级缺乏基本安全感。在本书阐述的历史时期结束之际，在先进国家爆发了唯一的革命事件，一场几乎是局限一地、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起义，流血之多竟超过1848年的任何一次运动，于是各

国大为恐慌，紧急进行外交磋商。至此，欧洲先进国家的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尽管多少有点不情愿），“民主”（即在广泛普选基础上建立议会制政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无害的，虽然或许有点讨厌。对于这点，美国统治者已有所认知。

所以，喜欢激动人心英勇场面的读者，不会喜欢19世纪中叶这几十年的历史。这期间发生的战争不少，多于它之前的30年，也多于它之后的40年。其中包括由拥有技术和组织优势一方获胜的速决战，如欧洲国家在海外发动的大多数战争；类似1864—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甚至连交战国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忍卒睹的血腥屠杀，例如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在这段时期的所有战争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内战。这场战争获胜的一方，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更好的资源。南方败北，虽然它有较为杰出的军队和将领。有时也有一些充满浪漫和绚丽色彩的英雄故事，如身着红衫、留着一头鬃发的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此类例子因其稀少而十分突出。政治方面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诚如白哲特（Walter Bagehot）对政治成功的标准所下的定义那样：“寻常的见地加不寻常的能力。”拿破仑三世显然觉得他那伟大叔父拿破仑一世的大髻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林肯（Lincoln）和俾斯麦（Bismarck）无疑是伟大人物，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因他们面部的俊俏线条和他们擅长的漂亮空谈而获益匪浅，但他们获得的成就则有赖于他们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天赋。意大利的加富尔（Cavour）亦然，然而这些人完全不具备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伟大气质和领袖魅力。

这时期最激动人心的大事，显然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成就：全世界浇铸了几百万吨的铁，穿越各大洲的绵延铁路，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芝加哥等从美国中西部处女地上拔地而起的大城市，汹涌的移民潮等等。这是一出欧洲和北美强权主演的戏剧，

世界被踩在它们足下。那些衣着朴素的冷静之士，在建设煤气厂、铁路和提供贷款时，也展现出令人尊敬的特质和民族优越感。不过人数很少的冒险家和拓荒者不属此列。

这段历史也是一出进步的戏剧（进步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波澜壮阔、开明进步，对自己充满信心，也感到满足，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必然的。西方世界一切拥有权势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希望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只有几个思想家和也许人数稍多一些的评论家凭直觉感到，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产生的世界可能与预期的世界很不一样，也许会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没有人认为时代会马上逆转。马克思也不认为会逆转。他预见1848年的社会革命，预见此后10年形势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认为革命是长期的。

“进步的戏剧”是个隐喻说法，但是对下列两种人来说这也是毫不夸张的现实。一种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千百万穷人，他们穿过边境，远涉重洋，前往一个陌生地方，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种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各国人民，他们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打垮，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控制，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需要在下列两种命运之间进行选择：一是抱残守缺，为维护他们的传统和习俗进行注定失败的抵抗；一是夺取西方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解并掌握西方的“进步”。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有胜利者，有受害者。它的戏剧性在于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不是胜利者的尴尬，而主要是受害者的困惑。

历史学家不可能非常客观地看待他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史家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无法同意最具代表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的见解：即认为由于技术、“实证科学”以及社会方面的进步，人们已可用自然科学家无可辩驳的公正态度来审视他们的现在，他们认为他们了解自然科学家的方法。（差矣！）本书作者无意掩饰自己对本书所述年代的某

些厌恶,甚至某种鄙夷,但由于敬佩这个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由于竭力想去理解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因而稍有缓和。许多人喜欢从危机层出不穷的20世纪西方世界来看待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世界,觉得那时一切都是信心十足,一切都是肯定无疑。作者对这种“想当年”的怀旧病不敢苟同。作者倒是同情一世纪前遭人冷落的那群人。无论怎么说,“信心十足”、“肯定无疑”云云都是错误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是短暂的,不是永久性的。正当资产阶级看似要完成之际,却恰恰证明自己并非统一的整体,而是四分五裂。19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胜利看来是不可阻挡的,但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却已不再一帆风顺。

这个转折点标志着本书所论时代的结束。不同于1848年革命(这是本书的时代起点),这个时代的结束没有一个合适的、全球性的具体日子可作标志。如果定要找个具体时间,就推1873年吧,这一年之于维多利亚时期,就好比华尔街股市暴跌的1929年之于20世纪一般。因为那年开始了当时一位观察家称之为“工业、商业和贸易都出现了最奇怪的、在许多方面堪称空前的混乱和萧条”,当时的观察家称此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873—1896年。

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上面这位观察家写道)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响到牵涉进战争的国家,也影响到维持住国内和平的国家;影响到拥有稳定通货的国家,也影响到通货不稳定的国家……影响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国家,也影响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国家。它在像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古老社会当中是令人叹息的,在代表新社会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加利福尼亚也是如此。对于贫瘠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Labrado)居民而言,它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对于阳光灿烂、蔗田肥沃的东、西印度群岛居民而言,

也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它也没有使居于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业波动最剧烈和最不稳定的时刻，他们的获利也最大。

这位杰出的北美人士撰写上述这番话的那年，正是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鼓励下成立的那一年。大萧条带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大萧条也可作为旧时代结束的恰当时间。